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56·百花时代



1956·百花时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6: 百花时代 / 洪子诚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ISBN 978-7-301-15371-0

I. 1 1… II. 洪…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1956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7640 号

书 名: 1956: 百花时代

著作责任者: 洪子诚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371-0/I·21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194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1956：百花时代》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8年5月，是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一种。列入“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著作，计有下面12种：

- 谢冕：《1898：百年忧患》
-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 孔庆东：《1921：谁主浮沉》
-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
- 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
-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
-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原计划尚有《1919：中国的青春》一卷，因故一直未能成书。这次，《1956：百花时代》作为“学术作品集”的一种而从“总系”中分离，但在写作动机、叙述方式等方面，仍属于这个集体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洪子诚 2008年11月

简短的前言

关于本书的写作，有下面的几点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着相当一致的意向。

二、本书的评述,限定于“文学”的范围内。文学变革是“百花时代”的构成内容之一,也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又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于其他领域,本书作者没有能力加以讨论,而且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在文学的范围内,希望能接触到其间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包括某些重要的理论主张的提出,创作上出现的变化,文学刊物和出版的状况,文学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和重新组合的情形,等等。评述的角度,采取以归纳的问题作为基点的办法。这肯定有许多重要的遗漏,特别是这个时期某些重要作家的较为完整的状况。另外,在地域上以北京作为中心。因为从50年代起,文学随着政治,中心已转到北京;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常常不过是对北京的呼应或余波。当然,像上海、四川等地这期间的情势,也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是本书留下的另一缺陷。

三、从年度上说,1956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的年份,也是文学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甚至1958年春天。1956年理论、创作和文学权力内部的冲突,在第二年得到展开,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因此,严格地将评述的主要内容限定在1956这一年内,是不可能的,在具体操作上,也有很大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事实中所要追寻的“意义”,也可能就隐藏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关注1956年,不仅要了解提出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体现“新质”的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的波动、曲折、沉浮、兴衰,造成这种剧烈变动的缘由,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理波动。这是本书为什么将年份加以扩展的原因。

四、发生于50年代中期的中国的现象,是复杂的。即使是文学的限度内,本书的作者也缺乏能力进行稍稍深入的评说。自然,评说是不可避免的,对现象的整理、对问题的初步归纳,都是作者的一种观点的体现。作者是这些事情目击者(广义上说)。当年他正在北京那所著

名的大学读中国文学。那所大学在“百花时代”和后来的反击右派的运动中，也是风云变幻而备受关注的处所。他看到、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这些风云。他认为，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理论上也许可以作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总之，“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于是，本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人作出评判，越来越失去信心。当时的“悲剧”在现在已有的描述中自然依故悲壮，而那些带有“喜剧”色彩的种种（现在看起来有些天真的想象，理论和创作的“叛逆”的有限性，在动荡的环境压迫下的各种紧张的思虑），如今也散发出悲剧的意味。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觉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状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目 录

自序	5
简短的前言	7
第一章 “百花运动”与当代文学	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1
域外的形势及其影响	6
方针的实施	11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18
“解冻”现象	26
心灵的“开放”	34
第二章 “规范”的调整与质疑	40
“万象更新”：当代文坛新格局	40
一个尴尬的话题	44
电影的锣鼓	53
“心计很深”的三篇文章	59
谁有资格批评“教条主义”	64
“尾巴翘得比旗杆还高”	68

第三章	“干预生活”的理论和创作	72
	“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	72
	对“灵魂锈损”的警示	78
	“侦察兵式”的特写	83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修改	86
	“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	96
第四章	《人民文学》和《文艺报》	103
	1956年的文学期刊	103
	《人民文学》的革新	106
	《文艺报》的编委会	114
	另一场风雨	117
	退却的另一方式	120
	“放心”和“容忍”	126
第五章	“广阔的”现实主义	130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130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	134
	保卫“社会主义文学”	141
	左翼文坛的“陈旧话题”	146
	“真实性”的话语	151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154
第六章	历史的“清算”	161
	奇怪的现象	161
	“丁、陈反党小集团”	166
	“辩证”与“反击”	175
	“历史”的梦魇	187

“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	191
《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	196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199
第七章 “胜利者”的悲剧	203
互相的误解	203
文艺激进思潮的崛起	207
派别之间	210
周扬等的“退却”	212
年表（1954—1965）	214
参考文献	230
后记：续“简短的前言”	231

第一章

“百花运动”与当代文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对于当代社会情势的变化，人们有时常会感到难以捉摸。就在1955年下半年，发生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也由此而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这些运动，使人们有理由去信服《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断语：“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①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岁末和1956年年初，情势却似乎产生了“逆转”。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稍后在城市里进行的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情况的估计有了变化。在他看来，农业、工商业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不是一个迫切的紧要问题，这个问题的顺利实现指日可待。由于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改变，毛泽东认为，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作出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而要求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1955年底，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

^①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

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

在这种情况下，对可以成为这项宏伟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资源”的发掘和动员，成为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就如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所说的：“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②而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他们的最大限度的投入，又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精神生产）的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的条件，是重要的许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情况的基本估计，也发生了变化。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被认为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对阶级斗争的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的这种评价，是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提出的依据或条件。关于这种依据和条件，在后来的陆定一的报告中作了系统性的归纳：“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如果在一两年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有很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的市场，胡风之流还在思想战线上猖狂进攻，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辨别什么是唯物主义思想、什么是唯心主义思想，不知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危害，那末，今天我们思想界已经大有进步。”不过，陆的报告中，却没有对“今天”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明确的说明。“第三，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①

这项政策(或称方针)的正式提出,要迟至这一年的年中。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时,陆定一、陈伯达等都提出了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上,应该实施把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中说,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采纳了讨论中的意见,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在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把这一方针,正式地公开提出,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②

随后,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北京的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② 参见夏杏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载《文艺报》1996年5月3日。

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①。陆在报告的开头说，今天所讲的，“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认识”。不过，报告的基本观点，显然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一种权威阐述。他重申这一方针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制定者明白，在实施这一方针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科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样的敏感的问题：既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那么，提倡百花齐放，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许诺“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是可能的吗？陆定一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文学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于是，报告提出要确定这一方针的实施的界限和范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陆定一指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不过他又强调：“对人民内部的唯心主义的落后思想，应该

^① 报告之后，陆定一收到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的72封来信，有的对讲话提出意见，有的发表感想。陆定一对讲稿作了修改后，连同郭沫若、茅盾、袁水拍等的5封来信送毛泽东，毛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报告全文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尖锐的，但这个斗争是从团结出发的……”陆定一在报告中，还提到前些年对俞平伯的批判，认为其中有粗暴的东西，并当场向俞平伯表示道歉。

对这个方针所作的解说，不管留下多少空隙和矛盾，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来说，毕竟是一件令人精神振奋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在这一时期，它指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和领导者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排斥）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了，“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是确定的战略目标，“必须坚决地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也列上了日程。在所谓反“左”和反“右”的“两条战线”间，很明显，指针已偏到对“左”的检讨和批评上。因而，这一报告在各阶层的人们中产生的强烈反响，应该说是可以想见的。而其中有关允许“自由辩论”所引述的实例，也对活跃思想、消除某些顾虑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陆定一在报告中讲道：

……在某一种科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

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大家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资料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

上述的种种提法，对刚刚经历了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之后的知识分子，乍听起来可能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就文艺的问题而言，如果有关创作方法和题材的上述说法得以成立的话，那么，一年前对胡风的文艺主张的批判是否有误？如果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因而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另外，如果真有作家起来主张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像一年后的江苏《探求者》月刊所草拟的启事那样，他们是否是合法的、应该受到保护的？这些有关“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在此时和后来，都没有人作出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提出“双百”方针时，不同时间的政策、主张之间的断裂的现象，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解的疑团。

域外的形势及其影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应该说也包含着国际环境的条件和因素，虽然在陆定一的报告中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论述。这一方针的提出，自然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现实的社会状况和对发展前景的预想，但是，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一切，对毛泽东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重要的推动。特别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所产生的震动。4月下旬，向北京党政军各领导机关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在3月讨论这一秘密报告时说，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

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①毛泽东讲话的主要观点，被体现在经过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②中。在这篇文章里，也涉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状况的估计，这种估计与以前相比，呈现了低调姿态：“若干年来，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东方”阵营的动荡和变革，以及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匈牙利、波兰所发生的事件，从正和反的两面，推动了中国的决策者们加强了原来就已存在的冲破苏联模式的立场，加快寻找中国式道路的探索。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这种矛盾因处理不当而发展到对抗的地步，都是这一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思路。

从文学艺术的情况说，当时苏联的变革对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更是明显而直接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基本上结束了对文化领域进行严酷控制的“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不正确处置、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恢复名誉。1953年夏天，女诗人别尔戈丽茨发表《谈抒情诗》一文，提出诗歌的“自我表现”

① 参见夏杏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载《文艺报》1996年5月3日。

② 载《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